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刘启营

(青岛农业大学)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及主体意识、个人发展等层面社会心态状况的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相异的特点,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心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D4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10-0071-06

一、前言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在东、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来自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的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本文中社会心态的含义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变迁的喜怒哀乐所体验到的自身所处的社会情绪基调、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态度而汇聚而成的共识。”^[1]内容主要包括社会认知、社会态度、行为倾向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不具有城市户籍、在外打工的“80后”、“90后”,年龄主要集中在16—30岁间。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没有务农经验的“农盲”,他们将自己人生目标定位在城市。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即所谓“三高一低”。^[2]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但又面临重重障碍。在此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状况如何?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态度及行为倾向怎样?他们与传统农民工社会心态区别何在?这些问题都

[收稿日期]2012-07-1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JCZH110;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1WC02。

[作者简介]刘启营,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

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他们的心声,也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方式。积极、健康、良好的社会心态,能够为年轻农民工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提供坚实的心理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良的心态,不仅影响农民工信心,而且会衍生诸多社会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本研究考虑到农民工人数多、流动性强、居住情况复杂等特点,调查主要采用抽样问卷调查兼观察法、个别访谈法等。分别选择山东省西部城市菏泽、中部城市济南、东部城市青岛进行了样本调研。本次调研农民工范围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也包括传统农民工,以期获得比较认识。本次调研时间为2011年10月—2012年2月,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788份,有效率为78.8%。涉及行业主要包括制造、建筑、服务业等领域。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状况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将30(含)岁以下、16周岁以上农民工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30岁以上界定为传统农民工。调查对象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人数的60.8%,传统农民工占39.2%。根据调研数据信息,从性别上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约占被调研人数的63.8%,女性约占36.2%;来自山东省省内的约占76%,省外的约占24%;从婚姻状况看,调研农民工已婚人数约占33.1%,未婚为65.5%,其他为1.4%,约2/3的新生代农民工未婚;从文化程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约占82.1%,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比传统农民工相对较高;从居住方式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城市大多没有自己的住房,主要以单位宿舍或租房为主,居住状况并不乐观;从工作时间看,86.7%的被调查者日工作时间超过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其中11小时以上的约27.9%,劳动时间超长;从收入来看,西部青年农民工大部分收入为1000—2000元,中部大多为2000元左右,东部大部分2000—2500元,较传统农民工稍低,属于低收入人群;从政治成分来看,约41.8%被调研年轻农民工为团员,另有2.9%为党员,其他为55.3%;从从事行业来看,所调研年轻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商业、建筑等传统行业,其中生产制造业比例稍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

课题组分别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个人发展等6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状况进行了调研,发现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表现内容及特点交织在一起,总体状况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在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失衡的社会心态,亟待关注。

1.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基本满意的。针对“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是否满意”,有32.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有48.6%的表示“一般”,另有18.9%的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总体上还是认可的,但仍有部分被调研农民工对此表示不满或担忧,值得关注。而在面对“当前社会分配是否公平”时,有39.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公平”或“非常不公平”,只有13.3%的认为“公平”或“比较公平”,在对“当前社会总体公平度”的回答中,只有11.1%的被调研者表示“公平”或“比较公平”,有34.5%的表示“不公平”或“非常不公平”,反映出相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的社会分配状况及社会总体公平度方面不甚满意。

调查进一步发现,对于“遭遇到不公或权利受到侵害”时,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选择理性、合理合法途径解决问题,但也发现有9.4%的农民工会选择“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抗议或暴力”等“非制度化”手段,另有“17.1”的农民工选择“默默忍受”、“发牢骚”等消极的方式。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不公平、非正义时理性、积极与感性、消极态度并存,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甚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成为潜在的危机,易引发反社会现象的发生。

2.社会关系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关系方面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认知及态度,其行为倾向令人喜忧参半。在“对当前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调查中,有一半的人(50.7%)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只有8.1%的人认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另有41%的农民工认为“一般”,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虽然总体来说尚可,但依然有部分农民工不甚满意,人际关系满意度亟待提升。在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上,有高达

78.1%的年轻农民工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可以接受”或“无所谓”,比传统农民工的51.6%高出26.5个百分点,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念上更加开放、前卫,这种趋势需引起注意。而在“城里人对您的态度如何?”的回答中,选择“一般”、“歧视”或“敌意或戒备”的总计占66.9%,反映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依然不乐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观障碍依然没有消除。而“当城里人对您态度不好时”约45.5%的农民工表示会“主动与城里人沟通”,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主动、积极适应城市的一面,但也有约18.1%的人选择“默默忍受”或“报复城里人”等消极方式,体现出年轻农民工一方面呈现出能够积极主动融入城市的心态,而另一方面部分农工会采取消极、失衡甚至极端态度对待社会,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3.文化生活层面

相比于传统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生活的积极性更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为旺盛,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现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及相关行为倾向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之余,所从事的活动依次是上网(52.2%),看电视、录像(42.6%),聊天(41.6%),读书看报(30.2%),逛商场或逛街(31.6%)等。而传统农民工的选择依次是睡觉、闲聊(38.2%)、打牌(32.2%)、读书看报(30.33%)、上网(22.2%)、逛商场或逛街(18.2%)等,显示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突出,其文化生活内容方面较传统农民工文化需求层次更高,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体现出两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差异性。对于工作所在地文化基础设施状况的回答,53.6%的农民工选择“不完善”或“严重不足”,而在询问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时,约有60.3%被调查者选择“一般”,22.3%的人选择“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不甚理想。关于“文化生活不满意时,你会怎样?”的回答中,选择“默默忍受”的为12.9%,另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有34.3%,只有39.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努力争取”或“离开单位”。显示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而又无助的复杂心态。

4.政治生活层面

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对国家大事关注度、政治参与状况并不理想,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特点并不能掩饰其较强的政治或社会参与意识。相比较于传统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态度更为冷漠、消极,政治参与状况也不尽如人意。调查发现,在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回答中,有48.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关注”或“非常关注”,而传统农民工对这一关注度则为62.2%。在关于“您是否经常与他人谈论政治话题?”的回答中,有85.9%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经常”或“从不谈论”,而传统农民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为74.6%,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大事、政治问题的关注度显得消极而漠然。在民主选举与管理方面,约有28.9%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或“参加过最近的村委会选举”,而63%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没有参加过任何选举”,在参与单位民主管理方面,高达72.6%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没有参与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管理状况不尽如人意。在对基层选举的评价方面,约有43.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公平”,22.2%的选择“不清楚”,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选举的某种不满或漠然的心态。但调研同时也发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应该参与所在社区的选举或工作单位的管理活动,显示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与其较强的政治或社会参与意识形成鲜明对比。

5.情感心理与主体意识方面

在情感心理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孤独、焦虑感特征突出,压力感较为明显,应引起重视。调研发现,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孤独”,针对“在城市中您是否有过焦虑、烦躁情绪?”回答“经常有”的大约占调研新生代农民工的21.2%，“偶尔会有”的人约占65.5%。而在回答“遇到焦虑烦躁情绪时,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时,约有60.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通过一定方式,自我放松”,约有14.6%人表示“闷在心里”或“通过极端方式向他人或社会发泄”,反映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感情孤独”、焦虑感突出时,他们的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值得关注的是,在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选择理性方式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有部分农工会采取反社会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若工作涉及尊严问题您会”的回答中,55.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能容忍,就算要被炒鱿鱼,也不

行”,远高于传统农民工的34.5%,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尊严感更强,对精神、情感尊严的需求期盼更加强烈。而在“是否反感叫自己农民工”的回答中,有34.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反感”,高于传统农民工的26.4%的8.3个百分点,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更为突出。

6.个人发展方面

调研进一步发现,与传统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主要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满足于现实,并不像父兄辈单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的温饱问题,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呈现由“生存心态”向“发展心态”的转变,其职业发展充满梦想或期待。在“与您具有的素质技能相比,您的收入?”的回答中,64.4%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太少了”或“偏少”,传统农民工则为55.3%;在“您目前的状况是否达到您的预期目标?”的回答中,44.4%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完全没有”,而传统农民工这一数据为40.4%,表现出农民工整体上对个人收入及实现的目标与预期有较大差距,农民工对个人发展期望值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尤甚。数据显示,相比较于传统农民工而言,37.6%的新生代农民工“设计了目标,正在实现中”,高于传统农民工12.1个百分点,彰显出新生代农民工在人生设计规划方面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约有62.6%的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渴望得到“专业技术知识”,反映出对自身技能素质的不满意。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文化知识、专业技能有极强的探求欲以及积极进取的意愿,其继续学习、再培训意愿折射出他们强烈的再发展动机。

二、农民工社会心态问题的成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状况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在部分领域存在消极、失衡、不健康的社会心态问题,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社会变革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往往是矛盾的多发期,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显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在我国社会急剧变革的进程中,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心理公平感失衡。”^[3]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中,肩负着沉重的劳动而收入不高,目睹了奢华并富有诱惑力的城市生活而自身却无法参与其中,亲身感受到了贫富差距的现状,加之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内心难免会产生被剥夺感,心理公平感明显失衡。“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4]

受此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也呈现不确定性,“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中国,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造成了人生标准与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在这样大环境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价值观也呈现出不确定性”^[5]。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增强,社会参与与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加之受当前整个社会大环境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急功近利、浮躁的社会心态影响,在价值观上呈现出强烈的自我性、务实性、多元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使得他们的价值观与父辈、城市同龄人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从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新旧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而这些冲突必然影响其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6]。在这种冲突面前,年轻农民工易陷入困惑、迷茫之中,会表现出错综复杂、非理性的心态,部分人甚至会选择反社会的行为。

(二)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

从本质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社会现状是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在农民工群体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的同时,相应的配套社会管理机制却不甚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形成”^[7],尚未形成一个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多方面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福利,并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需要支付比市民更多的成本,无疑增加了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居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调研发现,年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并不乐观。企业或单位、个人交养老保险的仅占29.3%,医疗保险为43%,工伤保险为25.4%,失业保险为8.5%,从来没有交过任何保险的占35.6%,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期望的生活水准相比,距离还相当悬殊,而诸多硬性的限制条件使得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失去了现实可能性,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过客心理,

使其未来感、方向感缺失,影响着农民工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及行为选择,极易产生暴力的方式宣泄内心的迷茫、不满。

(三)社会支持系统不足

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和弱化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不足。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除了物质需要满足之外,其心理情感也需要得到满足,需要建立自己初级和次级关系网络资源,使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立足。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老乡、同事、亲戚等群体,而与城市居民家交流甚少,遇到困难、挫折时,缺乏一定的情感支持,同时相应的社会情感疏导机构缺失,致使其出现焦躁、抑郁等心理而无法宣泄。二是来自政府或社会的实际支持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立足于城市,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上融入城市,更需要得到城市的实际支持。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尤其需要来自政府或相关政府部门或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帮助,但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在阅历和经验上欠缺,使得他们缺少实际的支持,这也使得他们缺乏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此外,本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明显缺乏,农民工主动参与和享受城市文化生活的比例、程度还非常低,使得部分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枯燥、乏味,当工作生活种种压力无法得以释放时,易引发不良心态、消极情绪的发泄。

(四)身份认同困境的影响

当下,“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阻碍政府对农民工身份的制度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8]。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身份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对自己的农民身份存在强烈的认同感,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占比57.6%,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占比19%”。“尽管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存在着较强的农民身份认同,但由于在消费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农村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并产生了较强的城市生活倾向,因而开始有部分农民工表现出了城市人的身份认同”。^[9]但由于城市居民长期以来对农民工的“价值归属歧视”、“人际交往歧视”、“职业评价歧视”、“消费权利歧视”,^[10]使得农民工长期承受着各种偏见和歧视,甚至是不公平的对待,使进城农民工和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的隐性危险,造成了他们在“自我认同”与“实际被认同”中陷入冲突,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以至于有部分青年农民工对与城市人的交往也产生一种隔膜感和陌生感,由此而产生非理性、消极心态,如果任由这种消极心态发展,有可能诱发排斥性矛盾,引发社会不安。

此外,收入低也是影响年轻农民工心态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是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比较艰苦,经济收入较低,生活条件差,多层次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自然会影响到其社会认知及行为选择。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低收入人群的主体,其工资收入大多为1000—2000元,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处于收入较低水平,经济收入低势必会限制他们的消费,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也使得他们的自我发展预期目标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诸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剧了其“弱势”、“边缘人”的心态,从而产生负面的心态。新生代这种事实上的“为生存而活”的困境也影响了他们政治参与、文化消费等方面的积极性,呈现冷漠、淡然的心理,亦成为必然。

本次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在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个人发展等方面,其社会心态状况整体上是奋发进取、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充满积极进取精神,他们不仅仅注重物质层面,而且关注务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及情感寄托;相比较于传统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意识尤为强烈,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也将“生存”做为重要目标,但其心态更注重个人发展,“他们不仅看重工作的‘钱途’,更看重‘前途’与提高生活品质。他们消费意识强,并以此向世人、社会展示自我的能力和价值……他们还会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等”^[11]。从新生代农民工行为趋向来看,大部分年轻农民工在遇到问题时表示能够采取理性、积极的行为,表现出平和、包容的心态。但在既定制度下,由于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社会支持系统、身份认同困境、收入低等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诸多方面,诸如物价、社会适应、公平度、社会认同、情感心理等方面呈现焦躁疑虑、迷茫困惑、物质主义、消极等复杂

而多样化的心态,社会认同不甚满意,使得他们容易产生不公平感、忧虑感、失落感,进而会采取极端的反社会方式来解决,容易形成新的社会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值得全社会关注。社会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变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源于深刻的社会背景。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不例外,其社会心态的产生、发展、变化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及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善于发现内在的矛盾与问题,及早采取正确的策略,积极培育其健康、理性的社会心态,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此乃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 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
- [2] 段羨菊.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J].半月谈,2010(3):4.
- [3] 李有发.我国社会心态的变化趋向及其相关问题[J].兰州学刊,2009(12):114.
- [4][5] 梁宇.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及其成因[J].市场论坛,2007(4):50.
- [6][10] 黄进.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1、13.
-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11.
- [8] 胡晓红.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08(9):42.
- [9] 岳中志、彭程、徐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11(6):98.
- [11] 张志忠.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N].浙江日报,2009-7-6(第11版).

Social Mentality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u Qiying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s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society.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mentalit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relations, cultural life, political life, emotion, subject awarenes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show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overall healthy, positive and rational and they also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traditional migrant workers such as the negative, unhealthy social attitude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emergence of such mentality problems are not only due to the reality factors such as imperfect of social change, social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low income,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su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ident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hich need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Key words: Social Mentalit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stic; Social Cognition

责任编辑 裘晓兰